

敦煌變文體裁述略

羅宗濤

敦煌變文集所輯的七十八篇變文（廣義）中，保留原題的約居半數；其餘都是由於寫卷殘缺，原題亡佚，而爲近人擬題的。擬題的正確與否，這裏暫不討論；而先將標題原有的各篇備列於後，然後再加以比較：

講經的：

- (一) 八相押座文
- (二) 三身押座文
- (三) 維摩經押座文
- (四) 溫室經講唱押座文
- (五) 左街僧錄大師歷座文
- (六) 押座文
- (七) 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後題作——仁王般若經抄）
- (八) 太子成道經一卷（另一寫卷後題作——悉達太子讚一本）
- (九) 八相變
- (十) 降魔變神（後題作——破魔變一卷）

(四)降魔變一卷(後題作「降魔變文」一卷)

(五)祇園因由記(後題)

(六)目連緣起

(七)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并圖一卷并序(後題作「大目健連變文」一卷。另一寫卷附記作「目連變」一卷)

(八)頻婆娑羅王后宮綵女功德意供養塔生天因緣變(又出簡題「功德意供養塔生天緣」)

(九)歡喜國王緣一本(後題)

(十)醜女緣起(後記云：「上來所說『醜變』。另一寫卷作「醜女金剛緣」。又一寫卷後題作「金剛醜女因緣」一本)

(十一)秋吟一本

(十二)四獸因緣

(十三)嶼山遠公話

此外，擬題的講經文，有些後面附有小題，如維摩詰經講經文有的附有「文殊問疾第一卷」、或「持世并第二卷」；父母恩重難報經講經文第一篇則附有「誘俗第六」的小題。

講史的：

(一)故圓鑿大師二十四孝押座文

(二)漢將王陵變(後題作「漢八年楚滅漢興王陵變」)

(三)捉季布傳文一卷(又別出一題作「大漢三年楚將季布罵陣漢王羞耻羣臣拔馬收軍詞文」。另一寫卷後題作「大漢三年

季布罵陣詞文一卷

(四) 季布詩詠（後題作——季布一卷）

(五) 舜子變（後題作——舜子至孝變文）

(六) 韓朋賦（後題仍作——韓朋賦）

(七) 晏子賦

(八) 蕪子賦（後題作——蕪子賦一卷）

(九) 蕪子賦一首（後題）

(十) 前漢劉家太子傳（後題作——劉家太子變一卷）

(十一) 孔子項託相問書（後題作——孔子項託相問書一卷。另一寫卷題作——孔子項託相（缺「問」字）詩一首）

(十二) 茶酒論一卷并序（後題作——茶酒論一卷）

(十三) 下女夫詞一卷

(十四) 蘇武李陵執別詞

(十五) 百鳥名君臣儀仗（後題作——百鳥名一卷）

(十六) 鬪齣書一卷

(十七) 搜神記一卷

此外，有一篇是道教的變文，前後題都作「葉淨能詩」。

合在一起來看：講經的有：押座文、講經文、經、讚、變、變文、記、緣、緣起、因緣、吟、話等。講史的有：押座文、變、變文、傳、傳文、詞、詞文、詩、詩詠、話、賦、論、書、記等。看起來好像名目繁多，但稍加歸納，就可以變得單純些。

先看講經部分。太子成道經的後題作悉達太子讚，可見「經」就等於「讚」。降魔變、後題作降魔變文，可見「變」就等於「變文」；頻婆娑羅王后宮綵女功德意供養塔生天因緣變的簡題是功德意供養塔生天緣，可見「緣」也等於「變」；又醜女緣起、又作醜變、醜女金剛緣、金剛醜女因緣，可見「緣」、「緣起」、「因緣」，也都是「變」——也就是「變文」。再者，細按太子成道經和八相變在體裁上並沒有不同——雖然前者多標了幾個「吟」字，但並不是體裁的不同；而且，在唐代佛寺裏的變相，常有「某某經變」的，因疑「太子成道經」是「太子成道經變」的省略，就像「變文」簡稱作「變」一樣。所以，歸納起來，講經的俗講本子，只有「押座文」、「講經文」、「變文」、「吟」、「記」、「話」等類。

在講史方面：捉季布傳文的後題作大漢三年季布罵陳詞文，可見「傳文」就是「詞文」。前漢劉家太子傳、後題作劉家太子變，可見「傳」等於「變」。舜子變的後題作舜子至孝變文，可見「變」就是「變文」。孔子項託相問書、有的寫卷題作孔子項託相（缺問字）詩，可見「書」和「詩」兩種體裁也不必嚴格畫分。因此，在講史方面的體裁可有：「押座文」、「變文」、「詞文」（或傳文）、「書」（或詩）、「詞」、「賦」、「詩詠」、「論」、「記」等類。至於百鳥名一篇，疑其未將文體名稱標出。

押座文、變文、記等三類，是講經和講史都有的名稱，所以合起來總共是十二類。茲一一討論之：

「押座文」：

押座文並不能獨立宣演，而是在轉入正題以前所吟唱的一段押韻的短章，其作用是在靜衆，孫楷第氏說「押」字的意思是「鎮壓」，等於「壓」字。這話是不差的，因為斯三七二八號寫卷就題作「左街僧錄大師『壓』座文」。和尚宣教，除禪宗頓教大師喜歡用棒、喝、茶、餅等新穎的辦法外，大抵都是循序漸進的。由於聽衆聞鐘而至以前，可能在不同的環境做着不同的事情，未必都能專心致志。初到寺中，可能還忙着和朋友招呼，心神不定，所以在大眾大體都坐定以後，負責維持秩序的維那就先作梵靜衆；然後法師再唱押座文使聽衆進一步收斂心神，以便適應將要宣演的題目和內容。這在對大眾宣傳時，恐怕是很重要的節目。

關於押座文，還有幾點要說明的：

(一) 有的押座文是專爲講唱某一經而設的——像維摩經押座文、溫室經講唱押座文等是。但是俗講的內容有時人體近似（如雜序因果、或太子成道、或宣揚孝道等都是常見的題材），於是，押座文也就可以互相假借，像太子成道經所用的押座文和八相押座文就沒什麼分別；而功德意生天緣和破魔變文也同用一押座文等是。

(二) 宣演講經文或講經性的變文，都有一個與佛經有關的題目，所以這一類的押座文的最後一句都是「經題名字（名字或作名目）唱將來。」讓都講唱出經題，而言歸正傳。但要是離開這個範圍，就不用這句套語，像故圓鑒大師二十四孝押座文講的是二十四孝，就無所謂經題；又如左街僧錄大師壓座文，大約是在朝廷在各州建造舍利塔破土時宣演前所講唱的，可能後面的講詞是自己擬就的，所以也省掉了這句套語。

(三) 到底講史性變文有沒有押座文呢？故圓鑒大師二十四孝押座文既爲宣演二十四孝而設，二十四孝是屬於歷史故事的

範圍，而有押座文，那麼講史性變文也應該有押座文才對。只是二十四孝押座文的作者是圓鑿大師雲辯，他是個俗講僧，當然順着原來講經的習慣，至於非佛徒的講史是否也如此呢？在常理上來推測，應該也有押座文才是，因為縱使不是在宣教，講故事賺錢照樣希望收到動人的效果；而效果如何，聽衆的心理準備是大有關係的，話本的人話詩，後世說書有所謂定場詩，道理都是相通的，這該是沿唐代之舊的吧。所以現存的講史變文雖然沒有將押座文寫在上面，然而，像舜子變、董永變文等篇，就可以用故圓鑿大師二十四孝押座文來押座。

「講經文」：

敦煌變文集所收「講經文」有多種，但保留原題的只有伯三八〇八號「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一篇而已。其餘各篇，原題全都亡佚，其「某某經講經文」的題目都是近人看它和「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體裁相近而擬的。看來所擬大體不差，只是我懷疑它們可能就如「變文」一樣，也有着種種名稱，未必一律都題作「某某經講經文」。像斯二四四〇號寫卷原題作「溫室經講唱押座文」，因疑其後所敷演的題目應當是「溫室經講唱文」。又、伯二一七三號（收在大正大藏古逸部）題作「御注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宣演卷上」，又斯二一三二號則題作「金剛般若經宣演卷下」，其形式和講經文近似，只是內容嚴肅、文字典雅，不能當作俗講的話本來看。但「講經文」一詞，原本也沒有通俗的意味的。所以「講經文」一類的寫本，可能有的稱爲「講唱文」或「宣演」之類。

俗講的形式是先作梵，然後唱押座文、然後開經、然後開讚、然後懺悔、然後再行讚歎、然後解釋經題、然後入經說緣喻、然後又申讚歎、然後迴向發願取散。其中最重要部分，當然是入經說緣喻，這個部分的講唱，都是分序分、正宗、流通等三段，跟佛經的疏解相同。至其宣演的順序，則是由都講唱一段經文，然後法師加以解說，然後再以韻文吟

唱。講唱到一段落，法師就提醒都講唱下一段經文如，父母恩重經講經文之二就有「不生恭敬唱將來！」的唱詞；而下
面的經文就是「不生恭敬、弃恩背恩（按、經文原作『忘恩背義』。）云云」。又如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講經文云：「六
段文中第四段，都公案上唱唱羅！」有時法師則彙括下面經文的意思，提醒都講，如維摩詰經講經文之一有段唱詞最後
兩句是：「當日世尊欲說法，因更有甚人來也唱將來！」而下面的經文則為：「復有萬二千天帝，亦從餘四天下來詣
所而聽法」。

最重要的一點是「入經說緣喻」，在講經文裏所講唱的一切因緣譬喻莫不以經文為依歸。換句話說：就是以經為主
體，故事無論如何發揮，都是處在附屬的地位。

這裏要先說明的是作為「俗講」話本的「講經文」和一般佛經的疏解的差別，主要是它們通俗；而所謂通俗至少包
括內容、語言和音樂各方面。

「變文」：

大乘法苑義林章第七本云：「轉換舊形名變。」本來宣演講經「變文」的形式和宣演「講經文」的程序，並沒有顯
著的差異。然而「變文」却採用「轉換舊形」的「變」字為名，其間必定有着重大的轉變。比較講經文和講經變文的寫
卷，可以看出兩者最大的分別是：講經文必以某一經貫串全篇；而變文則以故事為主，縱然引了經文，也只是為了故事
的需要。這一主奴地位的轉換，才符合「變」字的名義。而俗講話本在文學發展史上的地位，至此方告奠定。

講經變文（包括緣、緣起、因緣等）除了不用經文來貫串全篇以後，其體裁和講經文幾乎完全相同，也有押座、開
經、開讚、迴向發願等節目，其正文部分，也必定是韻散間廁——也就是講一段、唱一段的。至於講史變文，有的和講經

變文相近——像漢將王陵變，除了頭尾的儀式不見保存下來外，其正文也是講一段、唱一段的。可是有的却不如此——像舜子變、通篇都押韻，而且以六言句為主，其次就是四言句了，其體裁稍近於賦；像劉家太子變（用後題）却又通篇用散句，全同於變文集的「記」。

「記」：

文體明辯云：「其盛自唐始也，其文以敘事為主。」變文集裏保留原題的，在講經方面有「祇園因由記」、講史方面有「搜神記」，兩者都是用散句來敘事的。

「吟」：

只有「秋吟一本」，以吟爲名。觀其體裁，和變文極爲相似，只是在變文的說白部分，秋吟則全用賦體。本來在講經文和變文的說白部分，往往會有駢語出現，因爲唐人寫駢文寫得很濫，無意中總會露出駢句，但講經文和變文的說白部分畢竟是說白——有的寫卷上就標注了「白」字。但「秋吟」除了詩歌以外，其餘都刻意經營，全以賦體表現。因此，當其宣演時恐怕全用吟唱，和典型的變文之有說白有所不同。

「賦」：

只有講史性變文用賦體，有韓朋賦、晏子賦各一篇，又有內容不同的兩篇燕子賦。其中晏子賦應該是「記」，其體裁和搜神記並無二致，一點兒賦的味道也沒有。其餘三篇却是賦體，其中雖也有詩，但畢竟以賦爲主，跟秋吟以詩爲主不同。

「論」：

只有「茶酒論」一篇、假設茶、酒相辯難，最後由水出來仲裁，其茶、酒、水三者，略似陶淵明「形、影、神」三首詩，再往上追溯，又可牽涉到桓譚新論形神，列子「力問於命」、淮南子「魄問於魂」、莊子罔兩與景問答之文。整個看來，茶酒論是設論體，而通篇則以四言韻語為主，其次是六言韻語，偶然也用其他句法，但都押了韻。

「書」：

以書爲名的有「孔子項託相問書」和「齟齬書」兩篇。這兩篇的共通點是，除了七言詩以外，在典型變文作爲說白部分，它們全用四言韻語。單就這個部分來說，其句法和茶酒論相似。但整個看來它們有許多七言詩，而其餘的部分也都用韻，又和秋吟相似——只是秋吟的句法是四六，而這兩篇「書」則純用四言。

「詩詠」和「詞文」：

講史性變文有「大漢三年季布罵陳詞文」（即捉季布傳文）、和「季布詩詠」，都是詩歌——前者是一韻到底的七言長詩，後者是換韻的七言詩。季布詩詠裏面有「詩曰」、「詞曰」的字樣，可見「詞文」和「詩詠」並沒有重大的不同。兩者都是以詩唱來表現的。

「詩」、「詞」、「話」：

敦煌變文集保存原題，而且用「詩」、「詞」、「話」題名的有：「葉淨能詩」、「下女夫詞」、「蘇武李陵執別詞」、「崑山遠公話」等四篇。其中只有「下女夫詞」全篇都是短詩組成——前半篇是四言詩、後半篇是五言詩。要是這篇不是從一有說白的長篇逸出來的話——換句話說，它本來是獨立的短篇，那麼，這篇應當叫做「詞文」才是。其餘三篇，雖然名稱不同，但其體裁都是以說白敘述故事爲主，裏面間或有點小詩。因疑「詩」是「詩話」之略、「詞」是「詞

「話」之略、「話」也是「詩話」或「詞話」之略——就如「經變」既可略稱為「變」、又略稱為「經」一樣。這些都是「話本」。這裏所稱的「詩話」、「詞話」，是話本的詩話、詞話——像「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大唐秦王詞話」之類。以前的詩話、詞話本來就以記傳體為主。像「大唐三藏取經詩話」，日本三浦將軍所藏巾箱本題作「唐三藏取經詩話」；而日本富德氏成實堂文庫的宋刊本則題作「新雕大唐三藏法師取經記」。「大唐秦王詞話」、「英國博物院藏本則題作『大說唐全傳』」。而古人的「話」相當於我們說的「故事」，從隋經唐到宋都是如此，孫楷第氏的「說話考」、「詞話考」（民國二十二年師大月刊十期）有很很詳盡的考證，這裏就不贅述了。

根據以上所歸納的結果，再看敦煌變文集所擬的題目，有的似乎不甚妥當。像不知名變文之三、太子成道變文之二、太子成道變文之五（按，以上三篇是一篇割裂成爲三篇的，詳拙著「敦煌講經變文研究」第一章第二節）、太子成道變文之二、之五、都應當題作「記」。秋胡變文應當題作「話」。董永變文應當題作「詞文」或「詩詠」。